

七大代表忆七大

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七大代表忆七大

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大代表忆七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08-05854-7

I. 七... II. 中... III. 中共七大(1945)—史料
IV.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478 号

总 策 划 郭志坤

责任编辑 黄建章

特约编辑 齐书深

毕 胜

赵人俊

张利雄

装帧设计 傅惟本

技术编辑 姜华生

七大代表忆七大

(上、下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86.25 插页 17 字数 2,077,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5854-7/D·1013

定价(上、下册) 260.00 元



实事求是
力戒空谈
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 1945 年为七大纪念册的题词。



目 录(下册)

晋冀鲁豫代表团(续)

- 宋一平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 679
- 马吉林 为当七大代表而自豪 685
- 任志远 参加革命和出席七大 687
- 高扬文 难忘的七大 690
- 王 锐 永远珍藏在我心中的七大 704
- 王毅之 在延安出席七大 712
- 马佩勋 七大前后的片断日记 719
- 桂绍彬 在七大召开的日子里 730
- 徐深吉 在党的指引下前进 734
- 陈化争 参加七大前后的革命历程 737
- 牟海波 七大与我的人生之路 745
- 杨 青 终生难忘的七大 752
- 鲁大东 回忆七大前后 755
- 刘志坚 七大与全国解放的胜利 759
- 甘思和 无怨无悔的革命经历 765
- 朱德兴 终生难忘的五年 768
- 余成斌 七大与我——我是如何走出人生漩涡的 773
- 曹海波 整风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776
- 崔田民 回忆赴延安参加七大前后 779
- 杨泽江 永远牢记党的七大 782
- 杨泽江 毛主席为晁哲甫平反 787
- 杨得志 新的征程 790
- 刘德海 从红军战士到七大代表 800
- 陆定一 七大前后 805
- 康克清 党校生活和出席七大 812

七 大 代 表 忆 七 大

- 张广才 回延安学习及出席七大 820
李志明 七大与我这样的人 821
潘开文 在七大前后 825
钟元辉 在革命战斗里成长 829
王政柱 我的成长之路 832
王英高 永世难忘的七大 836

山东代表团

- 江 华 从投身革命到七大前后 849
朱春和 忆七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858
马国瑞 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 864
阎玉森 参加七大 终生难忘 868
关星甫 到延安参加七大 874
张次宾 奔赴延安参加七大 881
杜步舟 对革命经历的一点回忆 884
贾 震 我的革命之路 889
姚仲明 我参加了七大山东代表团 892
王力生 我的革命经历 895
董富先 七大前后 897
李贻树 回忆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历 904
苏 进 我的入党经历和党的七大 923
童陆生 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历 927
尚 明 我的点滴回忆 931
朱广泉 我参加革命和出席七大的经历 933
胡云生 革命生涯琐忆 939
杨永松 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942
徐运北 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出席七大 946
崔 健 半个多世纪后的回忆 950
王 枫 难忘的岁月 953
郭洪涛 赴延安参加七大 964
柳运光 从当选七大代表说起 968
李维真 铭刻心灵深处的盛会 976
李桂枝 赴延安 981

华中代表团

- 张鼎丞 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 989
伍修权 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和七大 1000

雍文涛	历史盛会——七大前后的回忆	1008
王盛荣	弹指一挥间 往事越千年	1011
曾 志	出席七大	1015
李质忠	我在七大上发言	1020
罗 琼	七大教育 铭刻终身	1025
李士英	回忆我参加七大前后	1035
左 英	七大对我的深刻教育	1041
谭友林	参加七大赴延安	1045
孔石泉	对七大的点滴回忆	1048
沈东屏	从新四军部队回延安	1051
张池明	到延安参加七大	1055
李永春	舍身取义护良才	1060
张金保	在延安出席七大	1063
杨建新	光荣不止属于我——七大与我的革命家庭	1067
郭述申	赴延安的惊险旅程	1072
周骏鸣	我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077
许军成	忆参加党的七大前后	1079
孙殿才	我的革命生涯	1084
陈 祥	七大——指引革命胜利的旗帜	1091
何 伟	为了新中国而奋斗	1096
周婉如	党的胸怀是博大的——我参加七大的经历	1105
王莹春	到延安学习和参加七大	1108
段焕竞	五千里路赴延安	1115
程祥元	七大与我的革命生涯	1122
刘宁一	从上海到重庆	1126
刘 贞	我参加七大的经过	1133
卢伯明	参加七大的回忆	1137
张妙根	追忆参加党的七大	1141
林一心	我在七大前后的经历	1147
刘 先	从冠尖马头岗到宝塔山下	1152
王明远	参加七大的前前后后	1156
肖 岗	赴延安参加七大纪行	1163

大后方代表团

邓颖超	整风与七大	1175
何 潮	我作为香港代表参加七大	1178
廖似光	在七大前后的岁月里	1184

七 大 代 表 忆 七 大

- 钟 明 党的七大教育我成长 1187
萧贤法 我的革命经历 1198
毛朗明 回忆在延安三次见到毛主席 1208
曹 璞 延安生活体会 1210
谢竹峰 长夜苦斗记——革命经历的片断回忆 1218
黄松龄 我在延安的收获 1225
赵 石 难忘的延安岁月——纪念七大六十周年 1230
曾 惇 从延安到武汉 1241
伍洪祥 整风学习与七大 1244
苏 惠 去延安参加七大 1260
王 维 在参加七大中学习和锻炼 1276
方 朗 终身难忘的七大 1281
李兆炳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参加七大 1286
王只谷 我在七大前后的革命经历 1291
廖志高 返回延安参加七大 1299
江浩然 回忆我参加七大的情况 1303
刘 云 难忘参加党的七大 1314

未出席七大会议的七届中委成员

- 李葆华 我被七大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321
万 毅 一段小插曲 1325
马明方 狱中斗争回忆 1327
刘子久 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日子里 1331

旁听七大人员

- 野坂参三 去延安 1341
佐藤猛夫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350

后记一 1358

后记二 1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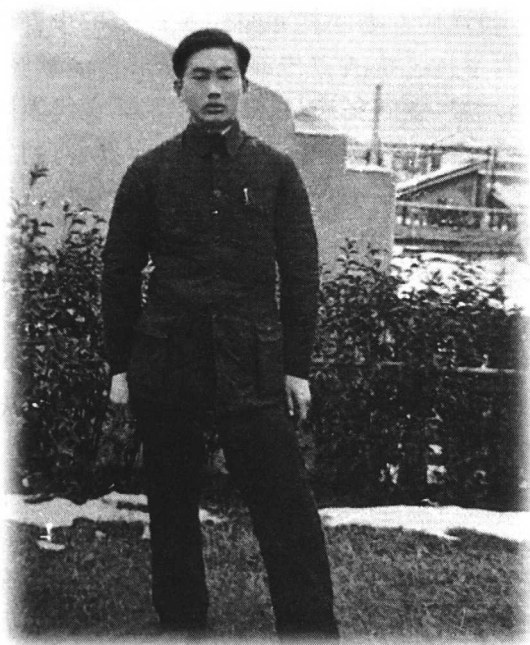
关于抗战时期的回忆

宋一平

我 1916 年生于湖北省石首县一个贫农家庭里。1928 年底至 1929 年春,段德昌和段玉林在监利县的洪湖和石首县的长江北部同时发动游击战争和创立根据地的斗争。我的家乡就是段玉林同志活动的“窝子”。我当时虽然只是一个 14 岁的共青团员,也根据团组织的指示,积极参加了最初的“武装暴动”。1929

年夏初,团鄂西特委在石首县召开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代表横沟市青年团支部出席了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三人组成)主席,并当选为团石首县委员会委员,从此脱离家庭,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1932 年 7 月,湘鄂西团省委派我到上海代表湘鄂西苏区青年团组织出席少共中央召开的各苏区青年团代表联席会议。这时敌人对湘鄂西苏区所进行的第三次“围剿”非常残酷,形势很严重。我随当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辗转数月,才于 11 月初从沙市乘船赴上海。

到上海后,与团中央接上关系。我同陆定一等几个苏区来的会议代表,住在沪西小沙渡路,等待其他代表到来。不久,突然接到消息,团中央已遭到破坏。我们赶紧分头转移,我被安置在一个工人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团中央通知我:会议不开了,我留上海工作,到沪东担任团区委书记。半年后,受党中央命令,同另一同志前往寻找贺龙主力部队,因带路交通中途逃走,不得已返回上海团中央工作,负责巡视上海各区团的工作。三个月后,又决定派我代表少共中央去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十二次扩大会议。准备了十几天后,1933 年 12 月,我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好不容易走到哈尔滨,与满洲省委取得联系。



1938 年,宋一平摄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为等去苏联的交通,在哈市逗留了约一个月,住在张浩同志夫人处。到旧历除夕前夜,省委才派一交通带我乘火车到绥芬河。初一借拜年为名,把行李丢在客店里,步行偷过国境,被苏联边防军拘留一天,关系打通后,才送我到海参崴乘车去莫斯科。到莫斯科时,少共国际十二次扩大会议已经开过了。经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当时为王明、康生二人负责)决定,我留莫斯科,到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曾被中共代表团指定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另外曾参加过少共国际第六次大会,被选为少共国际候补执委,代表中国少共参加少共国际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还在列宁学院学习。离开祖国和实际革命斗争已经四年,切盼回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党在召唤,我归国抗战之心更加迫切。到了年底,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经代表团(当时王稼祥同志负责)允许,与一批同志,其中有许光达、刘光梯等,一起结伴回国。

我们1938年初回祖国,途经迪化、兰州,在兰州过的春节,然后乘汽车到西安。当时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中央青委书记当时由陈云兼任,后来由凯丰兼任)想留我在西安工作,因此在西安住了二十多天。不久,党中央从延安,长江局从武汉同时往西安打电报,一个召我去延安,一个召我去武汉。林伯渠征求我的意见,问我先去哪里。我表示当然愿意去延安。于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派汽车把我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我谒见了毛泽东同志,并会见了中央许多负责同志,甚为兴奋。看到抗大的许多学生,他们活泼愉快,革命热情洋溢,

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使我这个刚刚从国外归来的人也大受感动。当时中央命我到长江局任青委书记。随后,张闻天和我谈话,说明国民党区青年(特别是学生)工作的重要,并谈了一下民运工作的大原则。我在延安只停留了六天,中央就派我去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

长江局青委有李昌、黄华等同志。我负责长江局青委的日常工作,在八路军办事处有办公的地方,别的人都分散在各个岗位上干自己的工作,不是经常或定期开会。开青年干部扩大会议讨论或决策重大问题时,才去找他们。和我经常联系的有李昌、黄华、蒋南翔。蒋南翔办《战时青年》,搞学联。杨学诚,是湖北省委青年书记。于光远,民先总队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张维民,董必武的秘书,董老当面告诉我,建议他参加青委工作;因为董老管民运,需要直接跟我们取得密切联系。何礼,《战时青年》杂志负责人。袁汝镛,青年救国团团团长。此外还有姜纪常等人。

长江局青委联系并组织了许多进步青年组织,举行了抗战宣传、募捐献金、讲演歌咏、游行示威,慰问伤病员、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等多种活动,并送了一些干部到前方去、到延安去、到新四军去,如李锐、谢邦治等同志,也送了一些青年到武汉周围的乡下。

那时游行示威、歌咏会搞得很活跃。东北救亡总会跟我们有联系,负责人是刘澜波。青年救国团是我们的主力,有相当影响,搞青年救国团的几个人都是原来民先的骨干。民先队在武汉有办事处,李昌是民先队队长。王文宾在第五战区(徐州为中心)成立了一个民先队,以王文宾为首,还有李锐。他俩曾到武汉汇报工作,我接见的。后来,第五战区撤退时,王文宾留下来,李锐回来了。王文宾后来在山东湖西事件中被错误“肃反”掉了。这是个很不错的同志,很可惜。青年救亡协会

是统一战线的组织，主要领导是我们的人，打的是叶楠的牌子。叶楠是国民党的，他也负责我们的一些团体。有一个有赵梅生，在青年救亡协会实际负责，他过去是共产党，被捕自首过。那时对自首问题看得很严重，用不用呢？后来决定这个人还是可以用。董老跟他单线联系。这些人同情、靠近共产党，接受我们的方针。我们通过赵梅生和叶楠，以及袁晓园等搞统一战线。我们派了很多进去，包括我的夫人关群波都在里面工作，此外还有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这些组织的活动也很活跃。

1938年六七月间，国民党对进步青年的压迫日甚一日，由限制、打击到禁止、解散进步青年组织的活动。8月，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和青年救国团、蚁社三个进步团体。并提出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反动口号，还积极筹备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镇压进步青年组织，企图限制我党领导的国统区青年运动。

当时国民党把凡是与共产党有联系、有影响的青年都找去谈话，问是否拥护三民主义，是否拥护共产党，是否拥护蒋委员长，是否拥护三青团。这些青年不知如何回答好，说不拥护不行，暴露了政治面目，便于国民党镇压；说拥护也不行，说拥护就要一切活动听从国民党，要你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于是这些青年就来问我们怎么办。我们给他们讲：拥护三民主义，但不一定要参加国民党、三青团，总不能让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国民党不是讲民主、要抗日吗？讲民主，要抗日，就要允许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存在；抗战是全民族的事情，不当国民党、三青团，也要进行抗战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是个大问题。我要求把这个问题提到长江局讨论，王明同意了。

我参加过长江局的一些会议。当时长江局的会议制度是常委轮流主持。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有陈绍禹（即王明）、博古、董必武等同志。长江局青委列席这次会议的，除我而外，还有李昌、黄华两同志。在讨论中，王明发言，大意是主张以“民先队”作基干，统一我党所领导的青年团体，与国民党的青年团相抗衡，青年统一战线要走“先分裂，后统一”的道路。他的这个意见，当时在会场上未见有人正面反对。我对以“民先队”作基干统一进步青年团体是不赞成的。我认为，单纯地拿一个民先队来统一，去对抗国民党对青年各个团体的打击是顶不住的，不但顶不住它的打击，而且更便于它的打击；还是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方便些。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比较灵活。国民党要统一到它那里去，你要拿民先队统一到你这里来，这样针锋相对，不利于灵活运用我们的斗争策略。再说，在武汉，我们搞得比较大的青年群众团体是青年救国团，民先在武昌只有一个办事处。至于“青年运动要走先分裂后统一的道路”，这个话更不对了，你不能公开喊分裂，那时我们和蒋介石还是讲统一战线呢！这与少共国际六次大会的精神、与中央的方针不相符合，我表示怀疑。王明发言后，我讲了不同意见。王明当时很不以为然，马上用奚落的口气说：“你小孩子懂得什么！”我当时是只有22岁，好像他是家长，他说了就应该算数。他这样讲话，我是很不高兴的。最后周恩来作结论时，除责成我们起草文件外，并表示：“宋一平同志的意见还是值得重视的，你们可以再研究一下。”实际上周恩来是支持了我的意见。散会后，我与李昌、黄华根据长江局会议的精神（实际就是根据王明的发言）商量了一下决议草案的基本轮廓，三个人分工，各写一部分。我写的是不是形势估计那一部分，记不清了，但是避开了组织问题。最后由李昌综合。草案写好后，我一字未改，复

写了五份。三份交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审查。当时刚好黄华要去延安，我请他带一份送中央，我自己留一份。黄华从延安来电说中央青委对我们的决议草案有异议。后来王明去延安开会回来，我请示他（他领导青委）如何办，他指示可在个别地方试办和在高级干部中作正式的、讨论性质的传达。说是试行，实际是要推行这个草案。我虽然有不同意见，但组织上还要服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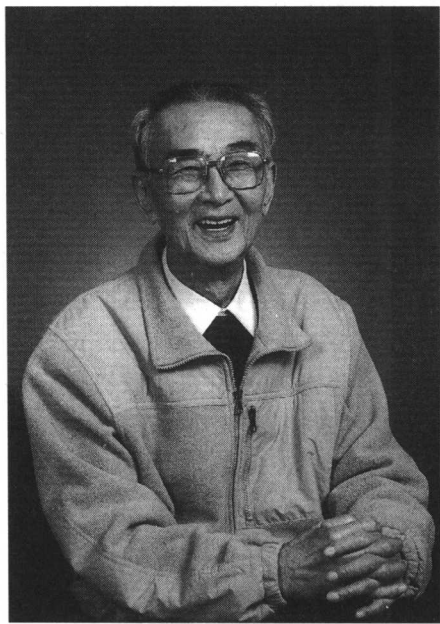
这时中央准备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青运工作是会议的议题之一，中央指定长江局青委参加这次会议。王明跟我谈，他要带李昌去开会，留我在家里主持工作，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8月底，我和东南分局青委书记陈丕显一起去参加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我们先从武汉坐火车到西安，然后坐汽车到三原。在三原接到中央的电报，要我赶快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这时，正好胡乔木也要去延安，适逢阴雨天，汽车不能开动，乔木同志从安吴青训班拉了一匹骡子，我骑上冯文彬同志的马。俩人结伴，不顾刮风下雨，经过六天的奔波赶到了延安。包袱一卸就去报到了，全会已经开始了，开幕式没有赶上。

在这个会议上，我见到了差不多所有的我党著名的负责同志，听了他们的报告和发言。在一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大家都集体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言谈举止，都给我以启发和教育（当时安排我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住一个房间）。

在青年工作的问题上，起初我还是拥护并坚持我们起草的决议草案的主要论点的。后来陈云和我谈了话。他说决议草案不对，他谈到关于三青团的估计问题。我当时也不太同意他的观点。我对他说，无论我们估计三青团是哪一色的翻版，都是抄袭德国法西斯搞“兰衣社”的那一套，是用来打击我党领导的青年

运动的。陈云说不能这样看，他想说服我，但当时我没有被说服。参加六中全会的三个青年人是冯文彬、李昌和我，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我们都发了言。关于三青团问题，我改变了看法，基本上同意了陈云跟我谈的意思。我感觉当时我对三青团的反动性估计得太大一点，不利于贯彻我党推动国民党走向进步的方针。针对这一点，我承认自己估计错了，在六中全会上发言作了检讨。但是我主张仍应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团结和组织我党所领导的广大青年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反对关门主义的组织形式。这一点还是对的。毛主席作结论时说：三个青年同志的发言都是好的（大意），这说明毛主席是肯定了我的这个发言。



笑迎 21 世纪的宋一平。

后来三青团也没有左转，随着抗战的进程，它却越来越走向反动。

六中全会后，中央青委决定调我到北方局工作，任北方局青委书记。

1941 年春，我奉召赴延安向中央青委报告工作，并准备出席党的七次大会。抵延安

后，七大延期召开，中央决定留我在中央青委工作。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极其困难的时期。当时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也掀起反共高潮，对根据地包围和封锁，因此陕甘宁地区的环境也极为困难。为克服敌后抗战的多重困难，党中央厉行廉洁政治，开展生产、整风运动，为坚持长期抗战，克服严重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中央青委机关于1941年秋迁往延安城外杨家岭沟口右侧山坡几排窑洞里。机构紧缩，人员精简。我分工负责管理敌后根据地的青年工作（其时，冯文彬调离青委任米脂县委书记），蒋南翔负责大后方（蒋管区）青年工作。这样，我便从1941年4月到1945年10月，共计四年半的时间，都待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没有变动。

这期间，我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和青委、民委许多同志一起去开荒，学纺纱，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主要是得到了一次最好的理论和实践密切相联系的学习机会。前后两次对于党史的研究（即《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的学习）以及整风审干我都参加了。这些学习，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使我真正弄清了党的历史，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一步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认识到我过去曾很佩服的“理论家”王明等人，不过是脱离实际、背诵书本、寻章摘句、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立场不稳、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者。延安的整风学习，把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我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水平也跟着有了很大的提

高。若是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地表明我在这个时期所学到的东西，那就是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的“实事求是”四个字。

1945年4月至6月，我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七大。

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寇投降，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抢夺胜利果实，新的内战即将爆发，中国革命到了决战关头。于是我开始争夺东北的斗争。

当时我在延安刚做完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本来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可一看到这令人鼓舞的大好形势，就再也坐不住了，马上去枣园找任弼时。那时他是政治局负责人之一，主管青年团的工作。到了枣园，正赶上任弼时和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那时毛主席去了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和平协定），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战略部署。他就让我列席旁听。因此，我对争夺东北的斗争有了较为清楚、具体的认识：蒋介石正准备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我们在华北也积蓄了充足的力量；苏联虽说依照同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准备将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实际上还是支持我们的活动的。因我曾在苏联学习过四年，熟悉苏联情况，还是少共国际候补执行委员，又懂得一点俄语，任弼时当即批准了我的请求，让我到东北去做青年工作。随即中央又决定整个青委都去，让蒋南翔和我带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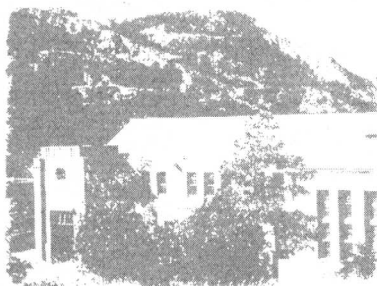
1945年10月11日，我们就带领一批青年干部约100来人，离开延安徒步北上了。



七大代表忆七大



宋一平 1916年生,湖北省石首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共青团湘鄂西省委书记、汉沔游击队政治委员。1933年后任上海沪东区团委书记、团中央巡视员。1934年赴苏联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参加少共国际工作。1935年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并以中国少共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少共国际第六大候补委员。1937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1941年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1942年任中共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工作,历任中共吉辽省委员会吉东分省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常委、中央青委组织部部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市委副书记、武汉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主任、武汉市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外事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等职。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为当七大代表而自豪

马吉林

我原名叫马占鳌,1936年9月参加了由薄一波同志组织的牺盟会,并于1937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吉林是我1943年去延安过黄河敌占区为防止被捕,按组织要求改的化名,一直沿用至今。我去延安是由太行区党委二地委指定的,当时是去延安党校学习,后由组织决定参加了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共755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我参加的是太行地委代表团,我的代表证号是81号,座位号26排8号。我们这个组由十几人



跨入新世纪的马吉林。

组成,现能记起的有当时的太行分局副书记薄一波、二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孝慈、团书记申之澜、工会主席赵国强等人。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当时,任弼时、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大会明确地提出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大会同时一致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党的七大是充分发扬了民主的大会。在讨论大会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对过去党内的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了批评,犯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七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在选举中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是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三)不要要求每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

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根据这些原则选举出来的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一个由各个地方、各个岗位、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汇集的有诚信的空前团结的领导机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我是1946年10月份离开延安的,先去了晋绥八地委,被任命为清(清徐)太(太原)徐(徐沟)县委书记,后被派往华北总工会太原办事处任组织部部长,直到太原解放。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更加体会到我们党的英明,同时也为有机会亲自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而感到自豪。我一定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力争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马吉林 1921年生,山西省榆次市东阳县人。1936年参加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榆次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2年到中共晋察冀区委党校学习,后任中共榆(次)太(谷)忻(县)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3年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七大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科长。1947年任中共清(源)太(原)徐(沟)县委副书记、中共清(源)太(原)徐(沟)县委书记兼吕梁军区第八军分区新编第十七支队政治委员。1948年任中共清源县委书记、中共晋中第二地委武装部副部长。1949年任太原市委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太原市工会组织部部长、省纺织工会主席、太原市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太原市轻工业管理局局长等职。



参加革命和 出席七大

任志远

1919年10月23日,我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河西村。5岁开始在私塾里读书。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后转入平民中学,曾就读于北平宏大学校、三晋高中、云山高中。1932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在大学期间,对于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十分痛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无能,看了一些进步书籍,以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同时参加了学友会、同乡会,结识进步青年,组织青年会,从事革命活动。在此期间又结识了李雪峰、郑林等共产党员,慢慢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33年春在太原秘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国际赤色互济会山西分会,后在该分会担任组织委员。1934年秋在太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的时候,我在太原烟厂给工人当业余教员,教工人识字念报,讲解革命道理。不久,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有人被捕后牵连到我,但敌人未能抓到我。1935年春,又有一件被捕的事牵连到我,警察局长带着一帮人到学校宿舍把我抓到了太原市警察局。因为我的身份当时尚未暴露,警察局允许我找保释放,因此我又逃过了一劫。第二天党组织让我到北平暂避一段时间。不久敌人发现放错了人,在山西全省

内发布通缉令四处抓我,并派人追到北平。在北平待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又到河南淮阳师范学校隐蔽。不久又回到山西,与当地地方组织取得联系,领导当地互济会进行活动。



1945年6月2日七大期间,任志远与任远喜结良缘拍的结婚照。

1936年红军东征后,我到了北平,找到了原来的党组织,经过审查后,组织上派我到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搞兵运工作,在学兵队任党总支委员。我带领学兵队去西京招待所了解被扣压的国民党将领的情况,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工作。后被派到张学良警察处工作,参加了陕西省开办的青年训练班,任训练班党总支组织委员。随后组织上派我到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工作,担任地下党总支副书记